

政治学前沿丛书

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 重大问题

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斥着大量的“虚假的知识 and 错误的真理”，需要我们认真厘清。本书从认识论上和比较历史方法论上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提出了“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的命题，以及中国政治学应该遵循的“语境—议程—方法”研究方法，对通行中的制度主义理论进行中国语境下的理解和建构。对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问题，如国家、民主以及国际冲突，本书也多有反思性的重新解读。

杨光斌 / 著

政治学前沿丛书

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 重大问题

杨光斌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杨光斌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5

政治学前沿丛书

ISBN 978-7-300-13728-5

I. ①政… II. ①杨… III. ①政治学-理论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4468 号

政治学前沿丛书

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

杨光斌 著

Zhengzhixue de Jichu Lilun yu Zhongda Went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3.75 插页 1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7 000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近年来本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三大领域，各个领域的论文分别汇集成册，或为文集，或为论文性专著。本册是关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文集，名曰《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与重大问题》；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文集命名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比较政治的研究成果《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是专著性质的，被选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与2005年出版的比较政治研究文集《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相比，《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多了更多的理论思考和建构。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谈到，中国政治学需要一场“知识革命”。从研究方法到基本理论，都需要重新审视在中国流行的理论与方法。从认识论上说，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科学”基本上是经验的产物。我认为，能够真正称得上政治科学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根据158个城邦经验总结而成的政体学说，既真实地描述了现实，又有很大的指导性。而二战后所谓的政治科学具有科学主义包装下的



意识形态色彩，科学性大大降低。比如，看似最为科学的理性选择主义之“阿罗不可能定理”所讲的社会不存在稳定多数，认为不存在共同的社会福利，其实就是为精英政治和精英利益说话的理论，难道美国大多数人不需要医疗保障？曾在美国比较政治研究中居统治地位20年之久的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不仅是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范式，更是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指南。因此这种看似科学的“定理”其实是最不科学的，“科学”包装特殊利益。

因此，在认识论上，我们可以说，第一，政治科学是经验的产物；第二，政治学是“人为”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第三，有限理性的人或基于真实的全面经验，或基于部分经验，甚或有意识地遮蔽经验而建构所谓的“政治科学”。据此，我们有理由说，第一，政治学没有被垄断，也不可能被垄断；第二，历史和经验本身就是政治学的来源，对历史和经验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学。正是基于这些，越来越专业化的中国政治学界应该在“知识革命”的意义上研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并传授既有的理论与方法。

本文集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知识革命”式的研究，但至少是反思性研究。第一章的几篇文章从总体上反思政治学，提出了“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的命题。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或虚无主义的虚骄，而是说中国人应该更专业化地从历史和经验出发，看看流行的理论和概念到底是怎么来的，而不只是简单地接受别人的理论和概念，否则我们只能永远是别人的学生，因为古希腊就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使西方人拥有超强的理论和概念建构能力，形成了理论的过密化甚至过度化。事实上，国际社会科学中流行的社会中心主义既是人的有限理性的产物，也是建构者故意遮蔽经验的反映。因此，我们不能从文本到文本，在解读文本时更要理解历史和文明史。比如，仅就文本而言，中国人似乎不是哈耶克和施特劳斯的对手，但他们的学说最终却都给西方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我认为，看似思想深刻的施特劳斯其实采取的是一种偷懒的，因而也是不负责任

的做法：从古希腊寻求灵丹妙药！结果只能以悲剧而草草收场。在该章，在批判性地反思西方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同时，也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几个范畴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专门思考放在本书的最后一章。

第二章是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议程的反思。我曾提出理想类型意义上的“新古典主义政治学”命题。我认为，中外的很多研究越来越具有“新古典主义政治学”的特征，即制度的重要性、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统一、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相互渗透。在这个命题之下，我提出“语境—议程—方法”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以区别于先有方法再寻找研究议程的所谓方法论至上的做法。我对自己的学生讲：没有猪，你准备再多的杀猪工具也没有意义。我向来青睐历史和比较历史法，自认为可以强化“语境—议程—方法”的研究方法，因而将历史比较的一篇方法论论文置于此处。

第三章开始反思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重大问题。首先当然还是国家问题。国家建设和由此而形成的国家理论很丰富（见《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这里只编入政治学教学中难以回避的国家理论问题。比如，关于所谓的“国家结构形式”（这本身不是一个好概念）即中央—地方关系，我们的教科书依然承袭传统的“单一制是一种普遍现象，联邦制是一种例外”说法。在民族国家形成中，情况是这样；而在现代国家建设中，则恰恰相反。这说明，流行的理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它所以流行，是因为人们没有历史地、比较地研究问题，只是简单地接受既定的概念。同样，流行中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重新认识。此外，该章编排了两篇关于国家流派的文章，分别是与中国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统合主义和国家自主性。

第四章是政治学的永恒问题即民主。在现实中，有人对民主崇拜有加，有人叶公好龙，有人则蔑视民主。但是，现代民主到底是怎么来的？西方人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是说的精英民主，而大众民主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因此，我提出的命题



是：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这与传统上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有根本区别。“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主义是一套价值体系，民主是其中的一个工具和一种价值；“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则意味着，民主是终极价值，社会主义变成了工具。我认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既在理论上说得通，也更真实地反映了制度变迁的历史。另外，民主流派很多，在我们谈论“协商民主”时自然喜欢“共识民主”。我认为“共识民主”是一个好的提法，但论证过程有问题，因此我就写了批评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的书评。

第五章是研究国际冲突的。因为专业知识背景，我主要是从政治学理论上探讨国际冲突的原因，并不过多地涉及国际冲突的过程。其中有的是我在美国读“美国对外政策”专业时的作品，有的是后来在美国教书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整理。因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密不可分，我也就把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密切相关的国际冲突研究作为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来看待。

第六章是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老实说，我在提出用于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范式”时，还没有系统地接触历史制度主义，阅读更多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这既是一个遗憾，也是一件好事，使我避免掉进别人的话语中而不能自拔，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所鼓励的。基于新制度经济学、中国自己的历史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当时我提出了“SSP 范式”。尽管这个“范式”存在不足和问题，但在很多方面耦合了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要素，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整合的一种自我建构。关于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的研究，我认为我的学生们做出了些许贡献，比如李月军提出了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曾毅针对制度突变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新解释。

我早就想写一本《制度政治学》，因为总有很多论文要写而一直未能落实。前一章的论文是关于制度政治学的，最后一章即第七章的几篇文章也都是专门讨论制度政治学的。我认为，马克思的思

想对西方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发掘不足。比如，西方主流的历史制度主义事实上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很大，或者有很多暗合之处，因而特别值得从范式意义上加以比较。同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还可以从罗尔斯政治哲学那里寻求思想灵感，至少可以对比其共同之处，从而让我们反思并总结政治学的新走向——新古典主义政治学。在寻找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资源时，我们还对新制度主义本身的属性加以反思，西方人认为它是一种中观理论，我们则认为新制度主义还有其宏观属性——取决于研究议程。

到写序言时，本书中的论文有两篇未发表，其他都发表在国内不同的学术期刊上，感谢各刊物的慷慨支持。本文集中有四篇文章是我的学生的作品，分别是张飞岸（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视野”、刘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合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李月军（中国军事科学院）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和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曾毅在硕士阶段写的“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还有个别文章是与学生合作的作品。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祝他们工作进步、学习丰收、生活愉快！

因为是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反思性研究，本书自然有不少值得切磋之处，也自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热烈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我相信，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严肃的学术对话将能逐渐过滤中国政治学，甚至中国社会科学中大量存在的“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涂尔干语）。

感谢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的热心支持。本人很荣幸作为该中心的顾问而参与其富有学术成效的活动，该中心组织出版的关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系列文献，都是该领域不可或缺的教学与研究用书。在此特别向他们表达敬意！感谢责任编辑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使得本书在技术上更加规范。当然，所有瑕疵概由作者承担。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对本人的支持，同时为郭晓明先生



的积极进取的专业精神所感动，与人大出版社的合作是迄今为止最愉快的工作关系。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 909 室

2010 年 10 月 15 日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学的总体性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

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	3
被掩蔽的经验，待建构的理论	
——社会中心主义的经验与理论检视·····	15
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误区·····	40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中的几对范畴·····	46

第二章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反思：方法与议程

政治学：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	57
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议程与研究方法问题·····	73
历史比较：现代化研究不可或缺的视野·····	82

第三章 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国家

国家结构理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问题·····	113
统合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129
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	144



“合法性”问题再认识 164

第四章 政治学的永恒问题：民主

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

——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 175

“共识民主”理论批判 203

第五章 政治学的国际观：国际冲突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威胁论” 213

亨廷顿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研究 225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246

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 273

第六章 政治学的历史观：制度变迁

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政治变迁的途径 287

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 314

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变迁理论 329

第七章 政治学的新趋向：新制度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比较 341

找回新制度主义的宏观属性 357

第一章

政治学的总体性反思：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学



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



张飞岸：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现状与其关注问题的重要性相比，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作为一位高度注重政治理论现实关怀的学者，您认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杨光斌：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实践应该是丰富政治学理论的重要资源。遗憾的是，相对于如此重要的政治资源，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总结很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一直以来似乎都不像西方人那样善于将自己的政治实践升华为具有学科意义的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城邦的简单实践，就写出流芳千古的《政治学》，而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有那么多经验，却只产生了一些远远不能反映其实际价值的作品，《论语》、《资治通鉴》等伟大著作虽然涉及修身齐家治国等各个方面，却缺乏学科意义上的体系性。其次，学科起步太晚，还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从恢复政治学学科到今天，不过 30 年的时间。要知道，美国政治学中的这个学派

* 此文是专访，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0）。现有部分调整。



那个学派，也是在美国政治学学科建立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段以后才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崭露头角，中间经过半个世纪的培育。也就是说，思维能力离不开智慧的信息遗传和长期的学科训练。最后，我认为一个不容回避的主观原因是，很多学者太过于自律，没有毛泽东鼓励的不要怕马克思、不要怕教授、不要怕权威的理论创新勇气。要知道，我们有鼓励言论自由的宪法，在宪法之下，创新空间非常之大。其实是很多学者太习惯于自我审查，那是自律过度。我一贯认为，相对于我党的领导人，很多学者的思想更落后、更禁锢、更没有创新意识，否则怎么会有邓小平理论？怎么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怎么会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想？不少人仅仅把做学问当做饭碗，缺乏现实担当的胸怀和勇气。相对于理论创新所投入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而言，研读几本权威文献要容易和稳妥得多。学者能否从书斋走向现实，从文本崇拜走向理论创新，是中国政治学能否走向世界的关键。

张飞岸：“文本崇拜”？愿闻其详。

杨光斌：在西方，往往是以一人之力就完成了显性思想体系的建构，过去有亚里士多德、洛克等一大批人，当代则有施特劳斯、罗尔斯等一大批人。这种不得不承认的历史和现实就意味着，当我们读到一个人的作品时，就有可能拜倒在这个人的脚下，形成“文本崇拜”——唯文本是从，用文本中的观点、话语解释一切，而完全不顾文本作者的“情境”，不顾被解释对象所处的特定时空。以施特劳斯为例，回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人的“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和德性完美”，多么诱人的言说！身处现代性困扰中的人们怎么能不对施特劳斯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是，在施特劳斯那里，所谓的“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和德性完美”的禀赋难道是你我之流应该有的？那是希腊人罗马人的特权，是希腊人罗马人后裔的特权！这种特权怎么能转移？又怎么能普世化呢？问题就在于，现代化、现代性把这种权利带给了黑人，带给了黄种人，带给了其他民族，而他们要么曾是奴隶，要么曾是世界的边缘人。能这样理解施特劳斯吗？看看施特劳斯的心路历

程，这样的解读并不过分。当法西斯学者卡尔·施密特将政治当做“分清敌友”和把国家当做“杀人的权力”的时候，施特劳斯一方面同意施密特的这种旗帜鲜明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同时认为他反自由主义反得还不够。谁是敌人？国家杀谁？当然包括法西斯主义中的所谓的“劣等”民族。因此，说施特劳斯持有潜在的种族优越论并不为过。

需要指出的是，和施特劳斯一样，西方很多学者具有种族意识，只不过迫于“政治正确”的压力，表达得比较隐晦而已。比如，当亨廷顿大谈“文明的冲突”的时候，其内在的忧虑则是白人优势地位问题；当另一位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兰德斯从文化角度大谈“国富国穷”的时候，种族意识和基督教文化优越论时隐时现。一个被种族优越论所歧视下的民族的学者，还在崇拜着种族优越论者，岂不是天大的悲哀？

张飞岸：我们都知道社会科学中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您为何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价值何在？

杨光斌：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充斥着不少神话般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常识”，它们被不加辨别地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渐渐地被内化为“定理”、“规律”和思维方式，以至于人们对“常识”不再辨别，不再思考，用“常识”去思考，用“常识”去讲故事、说历史、评现实，而这种神话般的“常识”却可能是伪知识、假规律。值得思考的是，不少并不符合很多国家历史的“常识”为什么依然流行？这就必须从认识论上追问，即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能够知道些什么？我们又是如何知道的？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就是使我们如何知道的知识体系，而社会科学深受观念的影响，观念又来自经验传统。这就对我们如何运用社会科学的有关理论来认识、知道我们所处的世界提出了挑战，我们是简单地套用既定的概念呢，还是要追问概念本身的意义，尤其是其渊源？无疑，要想更好地认识世界，就需要在比较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对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式的辨析。具体而言，我们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产生于西方经验的西方观念，而且



是基于特定经验而产生的特定观念。其中，基于英国和美国经验而产生社会中心论是由流派众多的政治哲学所构成的“社会科学群集”，或者说绝大多数政治哲学流派都带有社会中心论的印记。就这样，基于其他现代化经验而产生的思想和理论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掩蔽了，或者说人们不愿意接受根据德国经验而产生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更不愿意接受根据俄国、中国经验而产生的政党中心主义。我对现代化道路作这样的区分，按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或组织主体，依次为英美式的社会力量主导型、德日式的国家主导型以及俄中式的政党主导型。很多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社会力量不可能主导现代化，因此国家取而代之；而当国家失败以后，政党自然就成为一种替代国家的主导力量。在很多国家，政党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主导者，这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也是比较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问题是，在社会科学中依然流行着基于一种经验而产生的理论，并不加辨别地运用于完全不同的经验与文化之中。其后果是，不但形成了理论上的错位，更严重的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理论上的错位还导致了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错位，国家陷于动荡之中，有的国家甚至因此而走向失败。

张飞岸：也就是说，阅读世界文明史和我们自己的历史，对于重新认识一些流行的理论、概念和话语很重要。在政治学理论中，“民主”是个众说纷纭的概念，能否从世界文明史视野，谈谈您是如何认识民主的？

杨光斌：民主不仅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很多人都知道，今天的大众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因此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就提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使得民主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今天这个专利又演变为亨廷顿的“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甚至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定位。我的看法是，在第一波的现代化国家即英美法，民主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下层阶级共同推动的结果；此后，在包括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更多的发